

余福金明年退出“江湖”



余福金不是政治人物,也不是娱乐圈红人,但是很多新加坡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来。本地参与公共服务的人很多,像余福金那样深入民心的,或许就不多见。他自认,或许与他的身材有关,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他在关键时刻所扮演的角色,所提出的看法,也使他的形象在新加坡人眼中越来越伟大和可靠。

但是,今年59岁的余福金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却透露,他明年就要引退,过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了。

杜艳嫦 报道

去沙滩散步、吹吹海风,打打太极、写写文章、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、去自己感兴趣的课,多花点时间陪陪妻儿,这些很多人深藏在心底,希望有一天也能做的事,余福金明年准备去做了。

“明年我就60岁了,已经来到了人生的一个转折阶段,应停下脚步,过不同的生活了。”

他还是那副标准的笑容。

余福金的60岁愿望其实很简单:给自己两年的时间去做很久以来想做,却一直没时间做的事,希望人们在这段时间里把他忘了,让他远离众人的目光,重拾隐私,以家为中心,一过宁静的生活。

从现在到明年60岁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,余福金将在这一年里,确保工作顺利交接,才退出“江湖”。

余福金是个大忙人,工作横跨至少八个组织。最为大众所知的,他是NKF的主席,曾在二年前接获卫生部长许文远的一通电话后“临危授命”,把闹得满城风雨的NKF纳入正轨。他也是公共交通理事会的副主席,在2005年NKF事件发生的同一年受委,负责检讨公共交通业者每年一度提出的加价要求,并确保它们的服务素质达到起码的水平。与此同时,他也担任活跃老龄理事会的主席,鼓励年长者过积极活跃的老龄生活。

此外,他是五个公共理事会的成员。难得的是,这三个主席职位和五个理事会成员身份全是义务性质,除了公共交通理事会支付交通费外,其他职务他分文不取。

余福金说,到了明年他在NKF和公共交通理事会已工作四年,是退下的时候了。“一个健全的监督制度,四年已经足够,是换主席的时候了。”

那么,NKF主席的接替人选敲定了吗?

“还没有,不过我已经和几个心目中的人选接洽,希望他们能考虑担当这个角色。他会确保在新的主席被委任之后才卸去职务。而现阶段,他已为

NKF的董事部引进新的成员。

会考虑回忆录吗?

他笑说,不敢有此想法,不过自己一直以来有想出书的念头。至于内容方面,有可能会以自己多年来的经历,通过虚构的人物,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,作为大众可回忆的材料。也或许总结自己在社会工作这些年来所累积的经验,写一本参考书。

他自认不是写作能手,离开学校几十年,许多词汇已忘得一干二净,要写书是一大挑战。做为一个开始,他偶尔会通过连氏基金的刊物发表看法、磨炼文笔。

朋友认为他无须强求,建议他口述,由他人代笔,不就行了吗?他笑言点子不错,值得考虑。

余福金形容自己是个积极、务实的人。对于他说,“退隐”并不等于退休,他只需要暂时卸下繁杂的职务,离开镁光灯,给自己一些时间,养精蓄锐,为将来的20,甚至25年的工作做更多的思考。

他已经为以后的工作作了初步的构想:“我会继续为弱势群体和社区服务,不过,比较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帮助他们,例如用较低调的方式,通过写作或办讲座的方式,总之避开公众的注目。其他的就交给年轻、有活力的人来担任吧。”

他说,他考虑退隐两年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把他忘了,日后回来时,自己便以更轻松和低调的方式,再次投入社会工作。

2005年,当NKF出问题,他被委以重任带领NKF重新出发,最近的迷你债券事件发生后,他又被星展银行委任为独立第三方监督者;一个接一个的委托,在公众的眼里,他的分量不轻。但是,余福金却谦虚地表示,自己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trouble-shooter (调解人),哪里有问题就派往哪里去的人。

他说,新加坡社会讲求良好记录,当有事件发生,需要成立委员会时,人们总是习惯性的找大家熟悉的人物。他坦言自己找人做事时也不例外,最先进入脑海的总是曝光率最高的那几位。而他本人由于有NKF的工作记录,况且媒体访问者不拒,以致见报率偏高,才会经常被找人找上。

“其实我们周围有许多善良、诚实和能干的人,只不过他们处事低调,不为人察觉,所以当你搜索枯肠去找人时,他们的名字一时间没有出现在而已。”

余福金原本在三年前已退休了,可是才过了12天的退休生活便又重新披挂上阵。对于他这个向来闲不下来的人,他真的耐得住两年的退隐生活吗?对于这点,他似乎信心满满。

陌生人的祝福

余福金患结肠癌的消息公布之后,吃午餐时有陌生人上前握手慰问,令他倍感温馨。

于前个星期在连氏基金会主办的“死亡对话会”上透露自己在一两年前患癌的余福金说,消息见报后的一个星期,他与朋友在咖啡店吃午餐,突然有两个陌生人走到他跟前与他握手,祝福他早日康复。他先是一阵惊讶,但很快便回过神来,感到无比温馨。

在谈到为何患癌一年后才把消息公开时,余福金说,连氏基金会为鼓励人们为死亡做好准备而推出系列“死亡对话会”。他觉得很重要的是,由于他曾在死亡边缘徘徊,由他现身说法最恰当不过。于是,他做了这个连太太也不知道的决定。

与太太杜炳珠结婚25年,太太非常了解他的为人,知道他为了做一件他认为应该做的事,会不顾一切,全力以赴。

接下来,他将和著名DJ东方比利一起参与拍摄连氏基金会制作的《死亡对话会》纪录片。到目前为止,超过80人已经响应号召,分享他们如何准备面对死亡的经历。

余福金的父亲余炳亮博士生前曾交代儿女在他过世后,最多守孝七天,七天之后大家可以穿花衣上街,生活一切如常。他认为那也是为死亡作准备的一种方式。余炳亮博士在1994年过世,生前曾担任公益金主席,素有“公益金之父”和“慈善之父”的美誉。他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,余福金是他的幼子。

为死亡作准备,余福金认为除了生前签订遗嘱、买好保险,交代好殡葬仪式等等之外,还需要给家人做好心理准备。

他认为孩子18岁的时候,父母应该让他独立,逐渐让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转变为朋友的情感。

他说:“那很重要,我曾见过一些家庭,因孩子平时有过度的感情依赖,父母过世,他们完全崩溃。如果父母和孩子的感情关系犹如好朋友,一旦父母过世,孩子只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个好朋友般悲哀难过,但不至于崩溃,生活还会如常。如果我先离开而去,我不希望我的妻子和儿女为我的离世而崩溃。”

说到这里,他表示假如医生已经尽了全力努力,死亡最终会降临的话,他不愿意被当作实验品来延续生命。所以,他支持预先医疗指示(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,简称AMD),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签字。

戒一瘾留一瘾



余福金将和著名DJ东方比利(左)一起参与拍摄连氏基金会制作的《死亡对话会》纪录片。

很多人或许不知道,余福金有两瘾,一次患癌,余福金咖啡瘾总算戒了,但是烟瘾却戒不掉。

余福金的咖啡瘾不轻,他向记者强调他每天得喝“两大壶,不是两大杯”。

有一年,他带着家人到砂拉越的达迈海滩度假,在静谧清幽、与世无争的环境中,他突然萌生戒咖啡的念头,于是隔天早上,他拒绝咖啡,改喝其他饮料。

可是到了下午时分,他开始感觉头痛,而且痛得相当厉害。他意识到那是烟瘾所引发的症状。虽然他尝试服用止痛药,但到了晚餐时间,他已经无法忍受煎熬,终于叫了一杯咖啡。说也奇怪,喝过咖啡后,头痛的感觉逐渐消退。他的戒烟行动宣告失败。

去年年底,医生为他切除肿瘤,在住院的一个星期里,他再度尝试戒咖啡,这一次终于成功了。

他说:“养成习惯之后,即便一天不喝也没什么。”

现在他每天早上喝用水果、芹菜和甜菜根等调成的果汁,下午喝香茅水,其余的时间就喝绿茶。

唯一戒不了的是香烟。他在英国上寄宿学校时,在同龄朋友们的压力下,抽起了香烟。那年,他才13岁半。

这些年来,余福金不是没有想过要戒,也尝试戒了,但是最长一次不抽烟,也就是三个月。三个月后,他又“打回原形”。

这次生病,手术过后,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不曾抽烟,但烟瘾还是静悄悄再找上他。后来,他干脆放弃戒烟计划。他好像无可奈何,又似乎也无所谓的样子。然而,很明确不高兴的,是他的太太了。

花大钱要理智

这次的金融海啸事件,新加坡人需要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做个理智的消费者,但即便如此,不是很多人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。

余福金说,理智购物不仅适用于金融产品的投资,即使是购买其他产品也该如此。

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一般新加坡人在消费时通常不作深入思考,比如买一部车子,不管是6万元或是20万元,他们通常只问有哪些颜色可选,什么是免费的,对于车的性能、引擎的可靠性多大,多数

人不会加理会。再来说是买电脑,总以为功能越多越好,其实许多功能是他们用不上的,若改而购买一部操作简单的电脑,可以让他们省下很多钱。

他说:在花大钱消费时,需多问几个为什么,例如“银行给你5%,但定期存款年利才1%,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?如果你不明白银行为何可以给你5%,你最好别染指。”

单凭对银行的信任下重本投资是说不过去的,不管是2万5000元还是5万元,都是大数目,一些基本的原理在决定砸下资本时都应该弄清楚。”

金管局讲座 出席者不多

他认为或许公共教育可以起到一些作用,至少一些处于弱势的人不会盲目投资。但话是如此,经验告诉他,不是很多人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,有些人碍于面子明明不懂却装懂。

他说,活跃老龄理事会经常举办Moneysense理财系列讲座,那是得到金融管理局支持的讲座,有不错的参考价值,但出席的人往往不多。

他从中得到了教训是:即使有很好的公共教育、有很好的材料和讲员,最终一切取决于人,主办者可以不断尝试,但却勉强不来。